

【古籍今读精华系列】

# 语录四种

童雪 译注

王国维《人间词话》

叶玉屏《六事箴言》

朱熹《朱子读书法》

蔡锷《曾胡治兵语录》



这是一部历史名人的语录体著作汇刊，凝结着丰富的人生经验、精辟的哲理和深邃的思想，言简意赅，至约至精。它既是前人立身处世的经验总结，也是前人留给后人的一份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一本人生教科书。

「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崇文书局



【古籍今读精华系列】

# 语录四种

童雪译注

王国维《人间词话》

叶玉屏《六事箴言》

朱熹《朱子读书法》

蔡锷《曾胡治兵语录》

崇文书局



(鄂)新登字 07 号

【崇文斋·古籍今读系列】

## 语录四种

译 注：◎童 雪

策 划：蔡夏初

责任编辑：舒 骋

出版发行：崇文书局

印 刷：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5.5

字 数：446 千字

版 次：2004 年 1 月新 1 版

印 次：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4000 册

定 价：23.00 元

ISBN 7-5403-0223-2/I. 43

## 前 言

在丰厚而色彩斑斓的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中，“语录”体的文献具有重要的位置。这类文献大都言简意赅，至约至精，凝结着丰富的人生经验、警策的哲理和深邃的思想，既是前人立身处世的经验总结，也是留给后人的一份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有不少既名且佳的语粹、箴言，至今仍有着不衰的魅力，给人以莫大的教益和启迪。

据不完全统计，自先秦以至清末近代，结集传世的语录、箴言、语粹类文献至少有数百种之多。其中影响至巨且流传甚广的除《论语》、《孟子》等之外，较重要的还有南朝刘宋时人范泰的《古今善言》、北魏王肃所注《孔子家语》、隋代王通的《中说》、宋代张载的《横渠语录》、《语录抄》、程颢、程颐的《二程语录》、秦观的《劝善录》、谢良佐的《上蔡语录》、杨时的《龟山语录》、晁说之的《儒言》、朱熹的《朱子语类》、陆九渊的《象山先生要语》、徐积的《节孝语录》、元代许衡的《许文正公语录》、明代程哲的《晏先生语录》、陈献章的《白沙先生语录》、章懋的《枫山语录》、雷钟的《豫章语录》、吕楠的《吕先生语录》、毛宪的《三近斋语录》、赵仲全的《梅峰语录》、冯从吾的《宝庆语录》、《池阳语录》、《吴中书院语录》、《冯少墟关中四先生要语录》、艾自新的《艾雪巷语录》、蔡懋德的《蔡忠恪公语录》、

冯时可的《黔中语录》、管志道的《东溟粹言》、高濂辑《座右箴言》、陆云龙辑《格言集》、陈继儒的《模世语》，清代则有清世宗所述《庭训格言》、张履祥的《杨园先生训门人语》、申涵光的《荆园语录》、颜元的《习斋语要》、李光地的《榕村语录》、彭定求辑《儒门法语辑要》、王懋竑辑《朱子论学切要语》、宋起凤的《家塾座右铭》、李来章的《学要八箴》、叶舟的《梅溪先生劝学质言》、胡达源的《弟子箴言》、程沅辑《修省格言》、傅伯辰的《戒淫宝训》、倪元坦所辑的《箴铭录要》、《儒门语要》、黄秩模的《学道粹言》、李棠阶《语录》、宋惠人《劝谕十二条》、蕊崖老人《身世金箴》、谢兰生辑《十家语录摘要》、周文龙《郁云语录》、邹泽《反身要语》、朱用莼《朱柏庐先生劝言》、《治家格言》、王仕云《格言仅录》、徐士俊《妇德四箴》、叶玉屏《六事箴言》、梁章钜辑《古格言》、丁晏辑《诸子粹言》、阙名氏辑《先喆格言》、金纁《格言联璧》、胡林翼《胡林翼语录》、张之洞《张香涛学使学究语》、沈源深的《劝学浅语》、宫南庄的《醒世要言》等，民国时期又有蔡锷辑录的《曾胡治兵语录》、姚永朴编《先生嘉言约钞》、周学熙选录《性理精言》等等。可谓琳琅满目，不胜枚举。

上述这些名目繁多的语录、箴言类文献，内容弘富，包容面十分广泛，举凡立身、心性、持家、教子、行事、交友、居官、治国、治兵乃至读书、治学、习艺、创作等人生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几乎无不关涉。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不妨说这是前人留给我们的生活教本。

然而，这些传世的语录、箴言类文献，除少数如儒家经典《论语》、《孟子》为人所习知并易于查检之外，大多数散见于各处，或收于相关文集、别集，或列于若干丛书、辑佚书中，搜检查阅殊为不易。同时，上述语录、箴言既是历史的产物，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它得以产生的时代的痕迹，有它的社会的、认知的局限。不少的语录、箴言往往是良莠并存，精华与糟粕俱在，这与

整个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两重性恰相一致。因此,对于前人所留下的萃语、箴言,从历史主义的观点来看,固有其可借鉴、可珍视之处,却并非可一律视作吾人言行的信条。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对此类历史文化遗产做一番系统的清理工作,将其中真正优秀而又难以搜检的语录、箴言加以甄别、精选和整理,无疑是一项十分有益的工作。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我们从中国传世的数百种语录、箴言体文献中选择出《朱子读书法》、《六事箴言》、《曾胡治兵语录》、《人间词话》四种汇为一册,题为《语录四种》加以整理、注释和今译。以期从一个侧面展示出中国语录、箴言类文献的基本面貌和主要特征。

本书选择的标尺在于:

其一,思想较为健康,含义亦深刻,足以为当代民众、学子得以借鉴或受到某些启迪的篇章;

其二,知识含量较大、趣味性强,具有闪光的思想、智慧,富于警发作用的名作;

其三,在某一或某些专学上集前代之英华,扬播真理,总结出成功的经验,指出为学处事的切实可行的路径,或揭示出某些意境的作品;

其四,在历史上有一定影响而至今传本较少不易查检的语录体文献。

这里汇录的《语录四种》大致体现了上述精神。其中的《朱子读书法》系宋代大学者朱熹的门人弟子平日所记朱熹谈话而成的语录类编之一,辑录了朱熹在自己读书治学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一套切实可行的读书方法。其弟子曾将这些读书方法的精要概括为: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咏、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等几句话,这其中既包含了读书治书的基本原则,也蕴含着一般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内容,很值得当今学人、学子悉心体

味和思考。《六事箴言》则系清代学者叶玉屏辑录前贤先儒有关持身、持家、居官、居乡、处世、处人等言论而成的语录汇编，几涵盖了人生的各主要方面，多富哲理，发人深省。《曾胡治兵语录》为近代名将蔡锷辑录晚清著名湘军领袖曾国藩和同治年间四大“中兴名臣”之一的湘军核心人物胡林翼用兵、用将、谋略诸方面的语萃，汇集了曾、胡二人在将材、用人、尚志、诚实、勇毅、严明、公明、仁爱、勤劳、和辑、兵机、战守等诸多问题上相对成功的经验。虽重点言兵事，然亦多处关涉处世等人生箴诫。《人间词话》乃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在词学领域内的一部划时代力作。在形式上虽为断简残篇、言诗论词，实际上却囊括了文学艺术创作的诸般领域。他提出的“境界”说，至今闪耀着逼人的光芒。尽管与严格意义上的语录体文献有别，但内中名言叠出，见地独步，具有无限的理趣和情趣，因而同可视为警句哲言之渊薮。以上各篇之内容旨趣与导读，已于本书之各相关部分别有论列。

本书所收语录体（或类于语录体）文献四种，分别由几位中青年学者予以整理、注释和今译。具体分工如下：

《朱子读书法》整理与注释：王雅红执笔

《六事箴言》整理与注释：宋俭执笔

《曾胡治兵语录》整理与注释：王雪华执笔

《人间词话》整理与注释：冻栋执笔

由于这些文献均善用典，经史百家广采博取，有的涉及历代人物乃至作品数百例，或多处关涉历史事件、名物制度、风俗习尚、词曲杂艺，或为了谐韵、对仗，惜墨如金，或沿用当时俚语，或隐喻借指，不露机锋，使得不少语句过于艰涩或深奥。因此，在注释和今译过程中，我们特别注意到如下几点：

一、对所收篇章中的用典和某些艰涩的语词，均简要地注明其出典和含义；

二、尽可能地注明某些语萃或句意的源流;对篇内所涉及的某些人物、作品、习尚、职官、地名或某些特殊用语,大都在注文中予以交待;

三、对于某些引据或诗词短章,与所言内容至为切要者,则尽可能地录其原文加以注释说明;

四、今译部分则大体在遵其原意的前提下,加以意译,以便读者参考。

应当指出的是,这里汇录的《语录四种》虽然是语录、箴言类文献中的尤佳胜者,但也同样带有它的时代局限。希望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加以具体的分析或判断。同时,由于这些文献在版本流传中所产生的某些讹误,我们在编录、整理过程中虽参据学术界的若干成果予以订正,但仍恐落叶之难以尽扫,几尘之不能全拂,加之我们的学识所限,可能还存在若干疏漏乃至错误之处,恳请同仁和读者予以指正。

本书在编写中,承罗立江、许倩、邹正阳、李淑华等代为查阅了部分资料,汪子宣、刘莉、伍承云、谢德孚等对初稿进行了审读,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见,苏里南、马利抄写了部分稿件,在此一并致谢。

编者  
1996年12月

##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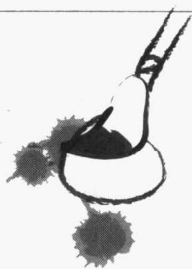
|              |     |
|--------------|-----|
| 人间词话 .....   | 1   |
| 六事箴言 .....   | 119 |
| 朱子读书法 .....  | 251 |
| 曾胡治兵语录 ..... | 391 |



之一

人间词话

王国维 著  
冻 栋 译注



人间词话导读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

——王国维（《人间词话》上卷）

古今学人、骚客论诗评词之作为数甚多。若

就诗论、诗话而言，自南朝梁代钟嵘《诗品》以降几达四百余种，而词论、词话类文献，自赵宋以来以至本世纪初叶，亦不下百余种。其中颇具特色且甚为时人推重者，堪推近代史坛、词坛巨擘王国维氏的《人间词话》。其目光之敏锐、论说之精辟、方法之辩证、见地之高远，可谓词坛独步，前无古人。在中国词学、美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史上具有突出的地位。

王国维（1877—1927年），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早年接受传统教育，并受到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思想的熏染。后赴滬上，在梁启超主编之《时务报》馆任职员，同时在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进修日文，兼习英语。治哲学、史学、诗学。在此过程中，复接受近代西方哲学、美学思想和方法论的影响。1906年，由于罗振玉推荐，赴京任清廷学部行走，后改任清废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学部图书馆编译等职，兼从事美学、文学理论和戏曲艺术史研究。辛亥革命爆发，随罗振玉赴日本，潜心研究中国古文字、音韵学、史学、古器物学及文学，成就斐然。归国后，先后被聘为北京大学国学门函授导师、清华大学研究院教授，为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之一。除研究古史外，兼从事西北史地和蒙古史料的整理与考订。1927年自沉于北京颐和园昆明湖。

王氏于学，既博且精。他学无专师，自辟户牖，平生治经史、古文字，兼及文学、美学理论，对于甲骨文、殷周金文、汉晋竹简和封泥的研究，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郭沫若语，见《沫若文集》第12卷《鲁迅与王国维》），他对于西北史地和蒙古史的考订和研究，至今仍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他主张以地下史料参订传世文献史料，对“两重证据法”有着精湛的运用，在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是公认的中国近代国学大师。王氏不仅具有深厚的国学素养，同时亦深受当时西方哲学理论

的影响，他研究过西方哲学和社会学，翻译过形式逻辑书籍，特别是经过近代西方自然科学方法论的训练。所有这些，都使得他能够突破传统史学方法的局限，对于中国古史能具有一种新的眼光和新的看法，使他的学术成就不仅不同于乾嘉考据之学，而且也比与他同时期的一些学者要深刻和新颖（李泽厚语，见《李泽厚十年集》第3卷《梁启超王国维简论》）。王氏的重大贡献不仅体现在史学、古文字、古器物学等领域，同时对文学、美学理论的研究也多有建树，历所发凡，于诗词文亦无不精工。他的《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乃是他在文学、美学理论研究领域内的代表性著述。其中《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史》影响尤为广泛。后者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一道，被称为“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均为“拓荒的工作”、“权威的成就”（郭沫若语），前者则被视为“中国近代屈指可数的美学著作”（李泽厚语）。这里我们所要介绍的是他的《人间词话》。

王氏《人间词话》最初有124则，属王氏亲手写定的稿本，曾由作者中选出64则，于1908年10月至1909年1月在《国粹学报》上分三期公开发表，1910年经作者删定为一卷。1926年俞平伯标点的《人间词话》单行本，由朴社出版，所收即此64则。1927年王国维逝世后，赵万里在整理王氏遗著时，辑录其词话未刊稿43则和其他词评4则，计47则，以《人间词话未刊稿及其他》为题，发表于当年《小说月报》第19卷第3号上。1928年罗振玉编印王氏《遗著》，把王国维生前发表的64则词话与赵万里整理刊行的王氏词话47则一并收入，分为《人间词话》上、下卷。从此时起，始有两卷本。1939年开明书店印行徐调孚校注《人间词话》，内中对罗编王氏遗著中《人间词话》上、下卷作了校注，并辑集王氏有关论词的片段文字25则，作为《人间词话补遗》附后，其中包

括樊志厚为王国维《人间词》甲、乙稿写的两篇序言。1947年重印时，复将陈乃乾所辑王氏词评7则补入。至此，《人间词话》三卷本共有137则，1955年中华书局重印徐氏校注《人间词话》，即据此本。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出徐调孚注、王幼安校订《人间词话》，以中华书局原排印之校注本为据，并依王国维氏原意，重行编次。以王氏手自删定，刊于《国粹学报》者（即通行本卷上）64则为《人间词话》；以王氏生前未发表但写入手稿本者（即通行本卷下）49则（其中含通行本未载而由王氏原稿补入者）作为《人间词话删稿》；又以各家所录王氏论词之语而原非《人间词话》组成部分者（通行本卷下末数条及通行本补遗）29则作为《人间词话附录》，计收王氏词话142则。1981年齐鲁书社所出滕咸惠校注《人间词话新注》，分上、下两卷，上卷收词话126则，据称乃据王氏手稿整理而成；下卷为附录，收王氏零星词话28则，重新编排次第。至此王氏词话已增至154则。1982年，陈杏珍、刘翘二氏查阅了王国维《人间词话》手稿，重新校订了《人间词话》版本，改正了其中某些讹误，将王氏生前刊出的64则作为《人间词话》卷上；将王氏生前未刊的49则作为《人间词话未刊稿》卷下；将王氏生前从手稿中抹掉的12则删稿作为附录；另将王氏生前自己选编、连载于《盛京时报》上的23条“人间词话”作为又一附录（见《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5期）。1983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印行姚柯夫编《〈人间词话〉及评论汇编》。内中将《人间词话》汇编了155则，分为本编（64则）、删稿（49则）、附录（29则）、拾遗（13则）。这是收录王氏词话条目较多的版本之一。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学术界有关王氏《人间词话》的整理、校注和改编的成果还有不少，比如佛雏校辑的《新订〈人间词话·广人间词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王振铎

《王国维词话新编》收于同编《人间词话》与《人间词》》（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版）、谭汝为校注《〈人间词话〉·〈人间词〉》（群言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等等。这些版本或研究成果，或对王氏词学、美学理论加以探析和阐发，或对王氏原作予以校注乃至改编，无疑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我们这次整理和注、译王氏《人间词话》，对已有诸刊本和相关研究成果予以充分的关注，并参据王氏原稿予以核实。其中对收录词话条目和编排次第则广采各家所长，而于徐调孚注、王幼安校订本和滕咸惠校注本采择尤多。计收录王氏词话152则，分为《人间词话》上卷（64则）、《人间词话》下卷（49则）、《人间词话》附录（39则）三部分予以注释和今译。附录部分剔去了徐调孚注本中所收题为“山阴樊志厚”者为王国维氏《人间词》甲、乙稿作的两序。这是由于此两序虽为王氏手笔，而命意实出自樊氏。此点前人已有考订。以樊氏所赏所评王氏诸词之语置于王氏《人间词话》之列，于理不合，故不取。是否有当，尚待进一步研讨。

王氏《人间词话》一方面充分继承了中国古代诗话、词话或诗论、词论的传统形式，另一方面则又突破了这种形式的局限，输进了他所处时代的新方法、新内容，将中西诗学、词学理论与方法熔为一炉，建立起一个虽不甚完善却颇具特色的崭新的诗学、词学体系。同时，《人间词话》虽以“词话”为题，而又限于词、诗，实已涉及乃至囊括了曲、戏剧以至整个文学艺术。就文学艺术的本质、评价标准、创作论、鉴赏论以及诗人、词家的人格修养等等并有揭示，不少方面甚具真知灼见。

《人间词话》（包括删稿和附录）虽然似乎只是零星论评、断简残篇，但它的中心论题乃是围绕“境界说”而展开的。王氏把“境界”作为创作和批评的最高标准，并力图阐明在

创作过程中如何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与路径。在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史上，以“境界”或“意境”来评论文艺作品，当然并不始于王国维。但是，集古典文论中“境界”和“意境”各种说法之大成，并将此丰富、发展为一种相对完整的文学理论或文艺学说，则是王国维的功劳。王氏标举“境界”，高屋建瓴地抓住了文学艺术最重要的特征。他明确地宣称他的“境界说”与以往的“兴趣说”、“神韵说”、“格调说”等相比较，是抓住了文学艺术的本质。他说：“沧浪（严羽）之所谓‘兴趣’，阮亭（王士禛）之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人间词话》上卷“境界为探本之论”条）。他把“境界”视为文艺批评的最高标准，认为“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人间词话》下卷“言气质神韵不如言境界”条）。对于诗词作品的评价，他指出：“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人间词话》上卷“词以境界为最上”条）。而缺乏了“境界”或“意境”，作品则无从言其佳妙处。

王氏强调“境界”所具有的艺术感染力，指出诗人、词家的情感、意趣和创造性思维在创作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人间词话》上卷“境非独谓景物”条）。这就是说，“境界”包含着“景”和“情”两个方面，缺一不可。文学艺术作品只有作到意象鲜明、情景交融、情境相谐方可步入“有境界”的艺术殿堂。王氏复指出，“景”与“情”或“意”与“境”的统一，还必须经由自然而巧妙的语言才能实现。他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人间词话》上卷

“大家诗词脱口而出”条)。显然,只有“情”、“景”、“语”三者有机统一的作品才能称之为高品位的作品。

王氏又进而提出“隔”与“不隔”的问题。他认为“情”、“景”、“语”三者达到完美统一的作品,叫做“不隔”;而三者未能很好统一的作品,则谓之“隔”。也就是说,“情”与“景”浑然一体,而语言亦清新、自然的作品是“不隔”的作品;情意贫乏、形象枯暗且语言晦涩的作品,读来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人间词话》上卷“白石写景终隔一层”条),则属于“隔”的作品。这事实上是指出了判别和衡量艺术境界优劣的标准问题。王氏在对具体的作品进行剖析、评论时,对南宋词人姜夔、吴文英、张炎等进行了大胆的批评,指出他们的一些作品用典僻涩、刻意雕琢,缺乏自然真率之美。同时,对于被词界视为别体的辛弃疾的词则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幼安之佳处,在有性情,有境界”(《人间词话》上卷“幼安有性情有境界”条),称其《贺新郎》词“章法绝妙。且语语有境界,此能品而几于神者。然非有意为之,故后人不能学也”(《人间词话》下卷“稼轩别茂嘉十二弟”条)。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作者反传统的精神和精辟见地。这是很值得加以肯定的。

王国维氏围绕他的“境界说”,还提出了“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这一对重要的审美范畴。前者是指的“壮美”之境,后者所指的是“优美”之境(《人间词话》上卷“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条),这实际上也是对艺术创作中两种不同风格的阐发。王氏在对艺术境界的构成进行分析、探索的基础上,又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首次提出了“造境”与“写境”,“理想”与“写实”的问题。从创作方法上分析,所谓“造境”即虚构之境,以表现理想为主,乃是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写境”即写实之境,以精微地描摹人景物事为主,乃是

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王氏还认为：“理想派”与“写实派”常常互相结合，成为一种新的创作方法。以此种方法所创造出的“境界”，很难分辨出它是“理想派”还是“写实派”。在这种境界中，“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人间词话》上卷“造境与写境”条）。即是说，“自然”与“理想”在此境界里已熔为一体，“景”与“情”相互交融。他认为这是上等的艺术境界。王氏进一步指出：文学艺术创作不能把自然之“物”全盘原样地搬进作品，必有舍弃，必有选择。而一有取舍则必注入“理想”；又无论如何的虚构和“理论”，总是离不开“自然”的素材和基本法则，因此“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人间词话》上卷“写实家与理想家”条）。这就揭示了“理想”与“写实”的结合是有客观依据的，同时也是可以达到的。

王氏在《人间词话》中还对诗人自身的人格修养等问题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看法。他认为词人须“忠实”，对“人事”也罢，对自然之物也罢，都应“忠实”地将其呈现出来，这样的作品才能真切动人，否则即为“游词”（《人间词话》下卷“词人须忠实”条）。他强调“内美”，即诗人、词家的人格与精神对艺术创作的主导作用，认为“无内美而但有修能”是远远不够的（《人间词话》下卷“词尤重内美”条）。他指出诗人要有“赤子之心”，即具有“真感情”，带着求真向善的良知、纯净无暇的发之内心的情感去感受人生和自然。他还强调诗人、词家在从事构思与创作时，既应“入乎其内”，还须“出乎其外”。他所概括的“三种境界”说（见篇首所揭）不仅指出了文学艺术创作实践中的基本过程和必经阶段，而且也揭示了治学、为文的方式和路途，因此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